



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研究——史前時期至19世紀*

ON GEO-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FROM ANCIENT TO 19TH CENTURY

陳鍇

CHEN KAI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kaichen@xmu.edu.cn

Received: 3 September 2019 / Revised: 30 October 2019/ Accepted: 20 November 2019

摘要

地緣文化關係是指，特定區域內的行為主體在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層面形成的文化關係。本文分析了影響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的三個要素，即華僑華人、跨境通道與佛教文化。接下來，本文從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層面，梳理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從史前時期至19世紀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地緣文化 泰國 中國 器物 制度 觀念

ABSTRACT

Geo-cultural relations refer to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actors in a particular region, which can be deconstructed into three levels, that is, utensil, institution, and concep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geo-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trans-boundary channel, and Buddhism culture. The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Sino-Thai geo-cultur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tensil, institution, and concept.

Key words: Geo-culture, Thailand, China, Utensil, Institution, Concept

*本文系中國僑聯課題（青年课题）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7CZQK204



緒論

研究地緣文化關係，首先要判定行為主體（如國家、族群）之間存在地緣文化關係的基本條件。筆者認為，這取決於三個基本條件：其一，行為主體的邊界相接；其二，特定區域內存在水、陸跨境通道；其三，特定區域內存在某種具有長遠影響力的宗教文化或價值觀。可以說，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兼具以上三個基本條件。

本文對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的研究，是對中國與泰國地緣關係研究，也是對地緣文化關係研究的一種增補與完善。本文旨在解答以下三個問題：其一，如何解構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的地緣文化關係？其二，影響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的要素有哪些？其三，如何把握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

一、如何解構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

地緣文化關係是指特定區域內行為主體（如國家、族群），在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層面形成的文化關係。筆者之所以這樣解構地緣文化關係，是受到梁啟超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的啓發。該文從器物、制度和文化三個層面，分析了當時國人意識覺醒的三個遞進階段：

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梁啟超，1984：833-834）

另一個有益的啓發，來自於英國學者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對文化的三層次分析法。根據這種分析法：「器物層面，也就是生產、生活工具；組織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面，即人的倫理、價值取向等。」（林毅夫，2009：6）

鑑於上述這兩位學者的分析方法，筆者從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層面來解構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其中，器物層面指一切有形可感的文化及相關的物質體現。器物層面為制度、觀念層面奠定了存續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制度層面位於地緣文化關係的中間層，它涵蓋了地緣文化關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制度和機制；地緣文化關係的觀念層面，指區域內行為主體間具有共性的宗教文化或價值觀。

二、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中的三個要素

在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中，存在三個要素，即以華僑華人為依託，以跨境通道為紐帶，以佛教文化為黏合劑。



(一) 華僑華人

有關華僑華人的界定，筆者沿用了莊國土教授的說法，即他們的「使用和流行，實際上反映了海外中國移民及其後裔這一群體的客觀社會身份（social status）和主觀認同(identity)的發展變化」：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華僑」是這一群體最普遍的稱謂，反映了這一群體在國內外(尤其是在中國國內)的官方和民間中被視為「僑寓者」、「中國人」、「中國僑民」，以及這一群體本身對中國的認同。50年代以後，這一群體中的絕大部分已加入當地國籍，在政治上認同於當地，在文化和族群儀式上認同於華人群體本身，「華人」這一概念也逐漸取代「華僑」這一概念。不少華人在文化、血緣上與當地土著混合，甚至日益趨同於當地土著，逐漸喪失華人的主觀認同和客觀標識(如外貌、語言、習俗等)，這部分人就成了「華裔」。（莊國土，2003：22）

對於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地緣文化關係而言，華僑華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在器物文化層面上，華僑華人是功不可沒的。正是通過他們，中國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傳入了泰國，推動了當地的社會、文化發展。比如，中國的珠算及其用法傳入了暹羅(泰國的舊稱)。（楊保筠，1997：86）歷史上，暹羅曾多次向華僑華人學習中國的制陶工藝。14世紀初，暹羅的宋加洛窯已經能夠燒制出類似中國浙江龍泉窯的青花瓷器與仿宋陶器。（朱傑勤、黃邦和，1992：505）15世紀之後，暹羅民眾日常使用的白瓷器、陶土器，在制法上均遵循中國的制陶工藝，其外觀也類似於中國瓷器。（施榮華，1997：20）

再比如，在曼谷王朝的拉瑪三世時期，中式糕點隨著華僑華人傳入暹羅。由於中式糕點深受當地民眾喜愛，以至於暹羅政府對中國糕點徵稅，並在官方頒布的《皇家稅則》中對此類食品做過詳盡的記述。中式糕點的傳入，對暹羅人的婚俗產生了直觀的影響。如今，在泰國人的婚禮儀式中，通常要擺放月餅、雲片糕、方形花生糖和方形芝麻糖等中式糕點，喻示著新婚夫婦的婚後生活甜甜蜜蜜。（朱振明，2010：2）

在制度層面上，華僑華人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與泰國之間的文化融合。例如，隨著華僑華人的遷入，泰語中出現了大量的漢語借詞。在泰國語每千字中至少有300個漢語借詞。（孔志遠，2009：41）此外，泰語還吸收了中國的方言詞彙，比如，客家話、潮州話和海南話等。（王介南，1998：149-150）

(二) 跨境通道

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水、陸跨境通道的開闢與貫通，「首先由民間商旅往來，以有易無，逐漸形成商貿點，點與點連接而形成交通線」。（宋蜀華，1996：6）自漢晉時期至今，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就存在著兩大水、陸跨境通道，即西南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以它們為紐帶，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得以長久、穩固地發展。



事實上，「西南絲綢之路不是一條道路，而是一個對外溝通的交通網絡。」（黃光成，2002: 68）換而言之，「西南絲綢之路應該是直到近現代以前，西南地區外向交通通道的統稱」。（黃光成，2002: 66）因此，本文探討的「西南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個連通中國西南地區與泰國的陸路跨境通道網絡。

在這一陸路跨境通道網絡中，部分支線是為了給越南、暹羅、緬甸和南掌向清廷進獻馴象提供便利。（何新華，2011: 79）為了進獻馴象開闢的支線，史稱「貢象道路」。（方鐵，2015: 119）據《雲南通志》卷十六「羈縻」條記載，「貢象道路」可分上、下兩路。從明朝開始，這兩條跨境通道由中國境內的兩個傣族地區(今德宏和景洪)向境外延伸，通往中南半島各國。（陳炎，1996: 242）

上路由永昌(今保山、德宏)過蒲縹、騰衝，西南行至南甸(今梁河縣)、乾崖(今盈江縣)、隣川(今隣川縣)三宣撫司。自隣川十日至孟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指阿瓦王朝都城)，又十日至洞吾(指明時緬甸東吁王朝早期首都東吁)，又十日至擺古(即勃固，明時緬甸東吁王朝後期的首都)；下路由雲南景東至車里宣慰司(今西雙版納景洪)，由此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今泰國清邁)，又東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今老撾琅勃拉邦)，再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擺古(今緬甸勃固)，與上路合。（《雲南通志. 1894》）

「貢象道路」的下路把中國與暹羅、老撾、緬甸三國連接在一起。（陳炎，1996: 242）時至今日，連通中國西南地區與中南半島國家的諸多公路與鐵路，大體也是沿著西南絲綢之路的路線行走。

與西南絲綢之路相比，連通中國與泰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屬於中國古代海上交通主幹線的一部分。據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海上交通主幹線分為「東海起航線」與「南海起航線」：

東海起航線又分北線和南線。北線自登州(今山東蓬萊)或萊州(今山東掖縣)起航，北越渤海，經百濟(今朝鮮)、對馬、壹岐等島，抵日本博多(今北九州)、難波(今大阪)；南線自楚州(今江蘇淮安)、揚州、越州(今浙江紹興)、明州(今浙江寧波)等地起航，橫渡東海直抵日本各地；(2)南海起航線又分西線和東線。西線自雷州半島或廣州起航，過南海，經今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分支經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各地)，橫穿馬六甲海峽，再經緬甸、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至非洲東海岸各國，支線進入紅海和波斯灣，可抵西南亞諸國；東線自廣州、泉州或漳州月港起航直抵菲律賓首府馬尼拉，再橫渡太平洋到北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然後分別往南美洲的秘魯、智利、阿根廷，以及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諸國。（朱傑勤、黃邦和，1992：425）

由此可知，連通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屬於「南海起航線」的西線。歷史上，中國的番禺、徐聞、合浦和交州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港口。（劉慶柱，2015: 46）以合浦為例，公元1-5年，漢朝使節從廣西合浦乘船，經越南、柬埔寨，渡暹羅灣，越過克拉地峽，而後乘船至印度。當時，據《漢書》記載，漢朝使節的行程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謚離國(在泰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在緬甸)，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在印度南部)，民俗與珠涯(海南島)相類。(班固，1962：1671)

另有學者依據上述記載，詳述了當時漢朝使節的具體行程：

漢使遠航南亞的航期，按常規推算，應在11月趁東北季風自徐聞，即今雷州灣岸的雷州市的海康舉帆啓程，沿著海岸繞過雷州半島到合浦，再沿海岸南行到日南障塞，然後再沿中南半島的海岸到達半島頂部，向馬來半島直航。這前後經過5個月的航行到達都元國，即今龍運，這時大概在次年的春天3月間。到夏季西南季風起時，又趁風向北航行4個月，到湄南河口的曼谷附近的邑盧沒國；然後沿暹羅灣海岸經20多天南航，到克拉地峽的東岸謚離國，棄船登岸，步行十多天，到克拉地峽的西岸夫甘都盧國，換船正好再趁北印度洋的東北信風及洋流，沿孟加拉灣的海灣，彎曲地向西南航行2個月，到達印度南端的黃支(建支)。回程則自錫蘭經馬六甲海峽到皮宗後回國。(周偉民、唐玲玲，2008：50)

另據史料考證，海上絲綢之路還可以細分為南、北兩線：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自日南邊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峴港)或徐聞、合浦出發，沿印支半島南下，船行五月，到都元國(今越南南圻一帶)，全程1060海裡，船再行四月，到邑盧沒國(今泰國華富里)，全程840海裡，再船行二十餘日，到謚離國(暹羅古都佛統)，全程約100余海裡。由謚離國登陸，橫越中南半島，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地區，與下緬甸直來人居地，包括薩爾溫江入海處和仰光一帶)，全程300公里。再船行二月余，到黃支國(今印度東岸建志補羅，出海口為馬德拉斯)，全程1728海裡。黃支之南有巴程不國(今斯里蘭卡)。……(海上絲綢之路)南線：自黃支出發，船行八月，到達皮宗(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一帶)，全程1700海裡，再船行二月，經新加坡、西貢，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峴港)，全程1700海裡。(王伯恭，1999：3895)

不難看出，當時連通中國和暹羅的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海陸兼行的航線」，由分段航行、沿岸各部族「轉送」的方法進行運輸。(陸韌，1997：52)

(三) 佛教文化

有關佛教的界定，本文採用了趙樸初先生的說法：

廣義地說它是一種宗教，包括它的經典、教法、儀式、制度、習慣、教團組織等等；狹義地說，它就是佛所說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術語來說，應當叫作「佛法」。佛法的基本內容可以用「四聖諦」來概括(諦的意思是真理)：苦諦，指經驗世界的現實；因諦(或集諦)，指產生痛苦的原因；滅諦，指痛苦的消滅；道諦，指滅苦的方法。佛經所說的道理非常多，其實都是圍繞四聖諦而展開討論的。(趙樸初，1995：23)



佛教的基本教義還強調，「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承擔道德責任和法律後果，這樣的教誨對每個人都是有意義的」。（洪修平，2016）

在中國，佛教以漢傳佛教為主。在泰國，南傳佛教則居於主導。

佛教傳入中國，距今已有2000餘年歷史了。它早已融入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並「成為其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黃夏年，2014：116）大體而言，這種融合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其一，佛教文化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其二，與儒道修養方法相結合；其三，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其四，與國人的人生理想相結合。（吳立民，1991：24）

用趙樸初先生的話來說，「佛教文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影響如此之大，要搞中國古代文史哲藝術等的研究，不搞清它們與佛教文化的關係及所受的影響，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趙樸初，1995：25）宋元之後，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滲透作用仍不容忽視。可以說，如果排除佛教文化，就很難認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與精神。（魏道儒，2013：537）可以說，對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佛教是最有影響的。（黃夏年，2014：114）

與漢傳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相比，南傳佛教對於泰國的影響，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素可泰王朝時期，佛教已被尊為國教。到了阿瑜陀耶王朝，佛教更為昌盛：

僧伽行政組織除沿襲素可泰王朝舊制，另對弘揚佛法有功僧人及具足德學的比丘，概給予尊封僧伽爵位，分為九級：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及師尊一級、二級；並依僧爵高下，由國家制定食俸。（淨海，2002：240）

在阿瑜陀耶時代，明朝鄭和的船隊曾於1408年經過暹羅。據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當時暹羅「崇信佛教，國人為僧尼者極多。僧尼服色與中國頗同，亦住庵觀，持齋受戒」。（杜繼文，2006：505）如今，從當前佛教信徒在泰國人口中所佔比例來看，為92%。（劉金光，2013：24）可見，在泰國，佛教無疑佔據著顯著的地位。可以說，泰國的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佛教而延續，而佛教僧侶與寺廟肩負著傳承當地文化的使命。佛教寺院長期扮演著學術典藏、教育場所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一方面，這使佛教經典得以妥善的保存。另一方面，佛教僧侶儼然是知識的繼承者與文化的傳播者。（學誠，2014）在泰國引入西方的現代教育制度之前，其初級教育多由僧侶以巴利文教授。（林秀梅，2006：186）

據研究，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區別主要在於教義理論與修行實踐兩個方面。在教義理論方面，南傳佛教將釋迦牟尼奉為教主，而漢傳佛教則提倡三世十方一切佛。在修行實踐方面，南傳佛教追求個人自我解脫，把證得「阿羅漢」作為修行的最高目標；漢傳佛教則宣傳普渡眾生，將建立「佛國淨土」作為修行的最高目標，甚至認為「普渡眾生」之後，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王伯恭，1999：852；賈平安、郝樹亮，1993：51）

就南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共同之處而言，佛教的基本概念「四諦」、「八正道」和「十二因緣」都是兩者遵循的基本教義。此外，佛教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基本教義，也是兩者共同遵守的。再比如，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中，還存在一種「菩薩信仰」，



即「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自利利他精神」，「這與人類社會的要求是相符合的，也是各個國家與歷代政府所提倡的思想」。（黃夏年，2016）

可以說，佛教文化對於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的發展而言，是一種上佳的黏合劑。

三、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的發展脈絡：史前時期至19世紀

本部分從兩個不同的歷史分期入手，分析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從史前時期到 19 世紀的發展脈絡。

（一）地緣文化關係的形成期：史前時期至11世紀前半葉

從文化考古的角度來講，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始於石器時代。在泰國境內的湄公河沿岸，也發現不少與中國西南地區具有共同特徵的新石器及新石器同時代的岩畫。（楊保筠，1997：7-8）具體而言，在泰國北部、東北部的攀牙府、北碧府和烏龍呵叻等地均發現了原始岩畫。「畫面以動物、工具和人物為主，主要反映的是狩獵生活。繪畫顏色幾乎全著紅色，黑色與黃色用得極少。」與中國雲南瀾滄江支流沿岸的滄源、耿馬等地發現的岩畫相比，兩者在內容與風格上存在諸多共同之處。由此可知，居住在中國雲南南部及泰國的族群，在新石器時期就已產生了文化聯繫。（施榮華，1997：7）

另據考證，公元初年，在今泰國的北部和中部地區出現過一些分散的、各自獨立的部落政權。最早的有「金鄰國」（亦稱為「金陳國」），位於今泰國的叻丕府境內。據中國史籍《扶南異物志》記載：「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死則取其牙齒。」（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1992）

在中國的典籍中，泰國多被稱為暹羅。據學者考證，「暹羅」一詞見於《諸藩志》中1225 年的「潯番」，《新元史》中1299年的「暹番」，《宋史》中的「暹」，以及《新元史》中 1282—1323 年的「暹」。（黎道綱，2000：250）暹羅原本分為「暹」和「羅斛」兩國。「暹」最早見《元史》。「羅斛」始見於《宋史》和《元史》。14 世紀，「暹」與「羅斛」合併，被稱為暹羅。1939 年改稱「泰國」。1945 年再度改稱為「暹羅」。1949 年又改稱「泰國」。（王伯恭，1999：5211；中國百科大辭典編委會，1990：821）

從官方典籍來看，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至少可以追溯至中國的西漢時期。據《漢書》記載，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中國使臣從廣東乘船，經越南、柬埔寨，渡過暹羅灣，越過克拉地峽，然後再乘船去印度。（傅增有，2004：132）另據泰國學者的考證，《漢書》中提到的都元國、邑盧沒國和諶離國，分別在現今泰國的巴真府室摩訶梭古城、素攀府烏通古城和北碧府。（黎道綱，2000：16）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已到過現今泰國的疆域。



(二) 地緣文化關係的發展期：11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

在這一時期，泰國建立了封建性質的國家。現今泰國的疆域，最初分屬於孟人（亦稱「勃固人」）和高棉人，前者控制著湄南河上游地區，後者統治湄南河下游地區和上湄公河流域。

（宋立道，2002：94；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1994：232）在湄南河上游地區，最早由泰族人建立的國家是「蘭那泰」。在蘭那泰的芒萊王執政時期（1259—1311年），其疆域由泰國西北部的清邁地區擴展到緬甸東北部的景棟地區。（施榮華，1997：25；賀聖達，1996：234）「蘭那泰」在中國史書上被稱為「八百大甸」。10—12世紀，該國被稱為「前八百大甸」（定都清盛）；12—15世紀，史稱「後八百大甸」（定都清邁）。（淨海，2002：200-201）1558年，「蘭那泰」被緬甸的東吁王朝征服。直至19世紀初，蘭那泰王國的故地才重新被納入現今泰國的疆域。（梁志明、李謀、楊保筠，2013：415）

在湄公河中下游地區，泰族人於1238年建立了素可泰王朝。在該王朝的第三代國王蘭甘亨（Rama Khamheng）統治時期，頒布了暹羅最早的文章法典，並於1283年創造了泰文字母，沿用至今。（李鋒、王榮科、王先俊，1992：86）後來，素可泰王朝被阿瑜陀耶王朝取代。阿瑜陀耶王朝之後，泰族人又相繼建立了吞武里王朝與曼谷王朝。

歷史上，暹羅首次向中國遣使朝貢是1289年，最後一次向中國遣使朝貢是在1869年。在這580年之間，暹羅與中國貢使往來的次數，共計160次，平均約每3年半有1次貢使來華。（江應梁，1983：44-45）到了清代，暹羅突破了清朝三年一貢的規定，在約70年間就遣使進貢35次，變成兩年一貢。（石維有，2004：54）

客觀上，兩國之間頻繁的朝貢貿易促使其地緣文化關係日臻成熟。比如，在明清兩代，中國為了增進與暹羅的地緣文化關係，設立了名為「四夷館」的外事翻譯機構。四夷館隸屬於翰林院，設有暹羅館等機構。後來，四夷館的材料被編輯成《華夷譯語》。這是中國最早的漢語外語字典，涵蓋了暹羅譯語等中南半島國家的語言。（張維華，1993：415）

從地緣文化關係的器物層面來看，泰國的許多宗教建築和廟宇雕塑藝術都帶有中國文化的印記。（施榮華，1997：45）比如，在曼谷王朝拉瑪三世時期修建的60余座佛教廟宇中，就有15座廟宇完全是中式的，其餘廟宇也展現出中國傳統建築的藝術風格。（王民同，1993：179）此外，曼谷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宮殿——輓拍茵宮，完全效仿了北京故宮的建築風格。

（施榮華，1997：50）輓拍茵宮建於阿瑜陀耶王朝末期，拉瑪四世時進行擴建，至拉瑪五世時竣工。有關這座宮苑的藝術風格，有學者是這樣記述的：

宮內主體建築是一座紅牆綠瓦的中國式王宮，華僑大賈捐資，構件均從中國購回，屋脊鑲嵌著丹鳳朝陽和雙龍戲珠，陪襯著琉璃瓦的飛檐，殿內雕梁畫棟，內容多為福壽祿三星、八寶或三國演義故事之類及山水景色。宮門口有一面鳳翔龍舞的大照壁。殿內門窗屏風全是金漆木雕。殿內陳設依北京故宮太和殿，正殿設有專供國王登位的「龍椅」。在天明殿內陳放著朱拉隆功大帝的「龍床」，牆上高懸蒙谷王和朱拉隆功大帝頭戴羽毛帽、身穿中國袞服的巨幅畫像，反映了中泰之間的友好交往。（韓伟，2003：37-38）



此外，華人還將中國樂器（比如笛子、揚琴和二胡）帶入了暹羅，「泰國音樂家加以改造後形成了泰國式的揚琴、二胡、京胡，這些樂器如今已成為泰國民眾用於演奏泰國民族音樂的主要樂器」。（朱振明，2011：502）

從制度層面來看，暹羅曾用過中國的曆法。歷史上，暹羅曾使用過五種方法紀年(大歷、小歷、佛歷、十二生肖、干支)和三種方法紀日(陰曆白分黑分紀日法、七曜星期周、干支)。（雪犁，1994：474）其中，干支紀年、紀日法，就從中國傳入的。例如，1292—1518年間，在泰國發現的素可泰碑銘之中，有7塊使用了中國的干支紀年和紀日。暹羅的干支紀年、紀日法與廣西壯侗語族、雲南西雙版納傣族使用的干支紀年、紀日法，是「完全相同」的。（周思源，2000：176；陳炎，1996：319-320）

11世紀後半葉至19世紀，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的地緣文化關係進入了一個發展期。與11世紀中葉之前相比，這一時期的地緣文化交流呈現出多層次、多領域的態勢。直到19世紀後半葉，中國與泰國相繼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至此，中國與中南半島地緣文化關係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並進入了一個發展相對平緩的時期。所幸，這段平緩期對於存續2000餘年的中國與泰國地緣文化關係而言，只是一段插曲。

結語

本文對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的研究，不僅是對其發展歷史的梳理，也是對兩國地緣文化關係研究的補充與完善。這也有助於深入理解當前中國與泰國的地緣文化關係的發展與前景。

參考文獻

- [泰]黎道綱. 泰國古代史地叢考. [M]. 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西漢]班固. 漢書(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 [M]. 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雲南通志. [M], 通行本為光緒二十年刻本，1894.
- 陳炎.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杜繼文主編. 佛教史. [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方鐵. 簡論西南絲綢之路. [J]. 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17 (3):114:120.
- 傅增有. 中泰文化交流的特點研究. [C]. 见：北京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東南亞文化研究論文集. 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
- 韓偉. 天涯足痕：海外考古訪問錄.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何新華. 清代東南亞國家貢象研究. [J]. 東南亞研究, 2011, (1) : 79–83, 94.
- 賀聖達. 東南亞文化發展史. [M].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 洪修平. 更好地發揮中國佛教文化的積極作用[N]. 中國民族報, 2016-01-19.



黃光成. 西南絲綢之路是一個多元立體的交通網絡 [J.]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2, 12(4) : 63–68.

黃夏年. 充分發揮佛教對外服務的民間外交功能 [C]. 见: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紀念文集(1964—2014)(上卷).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

黃夏年. 著眼東南亞地區佛教發展新趨勢做好雲南邊疆地區南傳佛教工作 [N]. 中國民族報, 2016-04-12.

賈平安、郝樹亮主編. 統戰學辭典. [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3.

江應梁. 古代暹羅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J]. 思想戰線, 1983, (4) : 44–52.

淨海. 南傳佛教史.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孔遠志. 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特點. [J]. 東南亞之窗, 2009, (1) : 54–58.

黎道綱. 泰國古代史地叢考. [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0.

李鋒、王榮科、王先俊等主編. [M]. 政治人物辭典.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梁啓超. 梁啓超選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梁志明、李謀、楊保筠. 東南亞古代史: 上古至16世紀初. [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林秀梅主編. 泰國社會與文化. [M]. 廣州: 廣東經濟出版社, 2006.

林毅夫. 經濟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復興. [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46(3) : 5–10.

劉金光. 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及其對我國對外戰略實施的影響. [C]. 见: 鄭筱筠主編. 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劉慶柱. 「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 [J]. 經濟社會史評論, 2015, (2) : 44–53.

陸勦. 雲南對外交通史. [M]. 昆明: 雲南民族出版社, 1997.

施榮華. 中泰文化交流. [M]. 昆明: 雲南美術出版社, 1997.

宋立道. 傳統與現代: 南傳佛教在當代社會中的調試. [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宋蜀華. 論西南絲綢之路的形成、作用和現實意義. [J].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1996, (6) : 6–10.

王伯恭主編. 中國百科大辭典 2. [M].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王伯恭主編. 中國百科大辭典 5. [M].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王伯恭主編. 中國百科大辭典 7. [M].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王介南. 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王民同編譯. 泰國華人面面觀. [M]. 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1993.

魏道儒. 佛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J]. 中國宗教, 2013, (11) : 29–31.

吳立民. 論佛教與中國文化. [J]. 佛教文化, 1991, (3) : 2–25.

學誠. 文明交流互鑒中佛教文化的價值. [N]. 中國民族報, 2014-04-08.

雪犁主編. 中國絲綢之路辭典. [M]. 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 楊保筠. 中國文化在東南亞. [M]. 鄭州:大象出版社, 1997.
- 張維華主編. 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趙樸初.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J]. 中國宗教, 1995, (1):23–25.
- 中國百科大辭典編委會編. 中國百科大辭典. [M].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0.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 民族百科全書. [M].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4.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 [M].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2.
- 周思源主編, 馬樹德編著. 中外文化交流史. [M].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000.
- 周偉民、唐玲玲. 中國與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
- 朱傑勤、黃邦和主編. 中外關係史辭典. [M].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 朱振明. 中泰關係發展中的一個亮點: 中泰文化交流. [C]. 见: 李一平、劉稚主編. 東南亞地區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1.
- 莊國土. 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 [M].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Kai CHE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dress (地址) :	
Room 310-3, Nan'an Building, Xiamen University, No. 422, South Siming Road, Siming District, Xiamen, China, 361005	

